

目 录

“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	冯友兰(1)
李石曾与北平大学区	吴范寰(13)
留法勤工俭学小史	江天爵(30)
对《留法勤工俭学小史》的补充	胡海秋(41)
焦作工学院始末	张仲鲁(46)
中华自然科学社简史	杨浪明 沈其益(62)
回忆世界舆地学社	屠思聪(95)
弘一法师	丰子愷 宋云彬(100)
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	陈浴新(116)
同善社见闻	米庆云(143)
蒋介石禁烟的内幕	萧觉天(157)
新桂系与鸦片烟	黄绍竑(175)
何键主湘时期的特税概况	傅益光(196)
贵州都匀建筑飞机场的内幕	官鼎良(210)
记赃官徐继庄	周纪曜(219)
庚子—辛丑随变纪实	岳 超(232)
晚清见闻琐记	溥雪斋(249)
质疑·补充·订正	
对《江桥抗战和馬占山降日经过》的订正	胡 震(257)

关于郑汝成之死的再订正·····	余立奎(258)
关于宁波旅沪同乡会·····	庄禹梅(262)
对《淮海战役蒋军被歼概述》的订正·····	杨熙宇(264)
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几点补正·····	梅汝璈(265)
对李振《起义前的几点回忆》的订正·····	陈 华(267)
关于陈觉民作汉奸的经过·····	陈 樵(268)
对《上海证券交易所概况》的质疑·····	丁裕长(269)
关于醇亲王府生活的订正·····	恽宝惠(273)
补充《马仲英入新随军见闻》·····	武志平(274)
读《马仲英入新随军见闻》补正·····	吴蔼宸(277)
关于宋绮云烈士事迹的更正·····	炮兵政治部宣传部(279)
对选辑第三十辑两文的订正·····	吴晋航(280)
对《唐继尧图川和顾品珍倒唐的经过》的补正··	万保邦(281)

文史资料工作简讯

民革各地方组织全面开展文史资料征集工作·····	(283)
--------------------------	-------

附注

- 对《李石曾与北平大学区》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四十八辑二四九页。
- 对《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四十八辑二四九页。
- 对《庚子——辛丑随銮纪实》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四十八辑二五〇、二五一页。
- 对《晚清见闻琐记》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五十一辑二七〇页。
- 对《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几点补正》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四十八辑二五〇页。

“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

馮友蘭

我于1915年入北大哲学系学习，1918年毕业。于1928年到清华当教授兼行政职务，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又回北大当教授。北大和清华这两个大学，在解放前的中国教育界，各自代表一种风格；在解放前学术界也各自代表一种流派。

在“五四”以前，北大是中国唯一的大学。它是“戊戌变法”留下的“新政”之一。我在1915年入北大的时候，有文、理、法、工四个学院，当时称为“科”。文科中有国文、英文、中国哲学、历史四个系，当时称为“門”。按当时的计划，应该有三个哲学門：中国哲学門、西洋哲学門和印度哲学門。实际上只有中国哲学門。1915年我进去的时候，在这个哲学門里，从观点、方法到教材，基本上都还是封建的一套。虽然如此，这一套还是代表中国封建社会的正规学术，跟专为应付科举考试所谓“举业”还是完全不同。在当时说，这也是可贵的了。

在我进入北大以前，关于中国旧学的知识，重要的是从家庭教育得来的，基本上是上面所谓“举业”一类的东西。到了北大，觉得眼界大开。经过初步的学习，这才知道于《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古唐诗合解》之外，还有《文选》、《文心雕龙》；于《纲鑑易知录》之外，还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鑑》；于《四书备旨》之外，还

有《十三經注疏》；以及所謂漢學、宋學之爭，桐城派和文選派之辯。當時，覺得五花八門，三家村里學究的知識，真是陋極。

當時的北大，就文科方面說，所講的已覺不是應科舉考試的“舉業”的一套，但是大多的學生思想的還是科舉的一套，就是說，還是以學校畢業作為取功名利祿的手段，認為學校畢業相當於科舉的舉人、進士等資格。當時入文科的人不多，一般人認為，既然最後總是作官，不如入法科，學習一點政治、法律，比較吃香。為了招收文科學生，北大只好特開方便之門，降格以求。當時認為大學畢業是一種很好的資格，因此入北大也要有一種資格，就是大學預科（相當高中程度）畢業。報考時須交文憑，不准用同等學力。只有文科可以不交文憑，用同等學力報考。

我在1915年在上海報考北大，報的是文科哲學門。我是有中國公學大學預科畢業文憑的。當時北大在上海主持招生的人很替我惋惜。他認為，有文憑而不報考法科，真是愚不可及。他勸我還是先報法科，在取了以後，如果我還是堅持要上文科，可以請改。如果我報了文科，以後後悔了，再請改法科，那就非常困難。我感謝他的好意，報上法科，取中第四名。暑假後入學後，我還是請改文科，果然呈文一上，校長馬上批了，正式用牌子挂出來，“照准”。

當時北大文科規定三年畢業。我在北大的前一半時間，就是在這樣的封建社會空氣中度過的。在後一半時間，來了蔡元培先生當校長。蔡先生在當時的威望很高。他來了以後，果然使北大風氣一變，面貌全新。照我所體會的，當時的“變”和“新”主要的有三方面。

（一）蔡先生到校後，聘請有名學者當教授，充實教學內容，辦各種學會、講演會，創造出一種學術空氣，並提倡“為學術而學術”。當時北大的學生，有不小一部分並不讀書。他們所需要的是一種將來

作官的資格。他們认为，在政界混，主要的不是靠真才实学，而是靠拉攏应酬，当学生时就要在这方面学习。他們看戏、吃館子，逛窯子。当时的“八大胡同”（妓女所聚的地方）有“两院一堂”之說。“两院”指当时的国会，众議院和参議院；“一堂”指北京大学（当时称为“大学堂”）。“两院一堂”就是說，去逛八大胡同的，以国会議員和大学生为最多。这些大学生当然談不上甚么学术；即是讀書的一部分学生，其中的多数也是认为，讀書是求利祿的一个途徑。在科举时代，鼓励人讀書的話是“书中自有顏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当时北大中讀書的学生也多还是这种思想。这在上面已經說过。蔡先生創造学术空气，提倡“为学术而学术”，是針對这种情况，对症下药。药果然很灵。风气造成以后，当然还有不注意学术和不为学术而学术的人，但是这些人为多数学生所鄙視，不是照从前那样自鳴得意了。

（二）蔡先生提倡学术自由，认为学术應該和政治分开，教授可以随意發揮自己的学术見解。蔡先生到校后，首先撤換了当时的文科学长（相当后来的文学院院长），发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独秀当时主編《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他当学长以后，請来了很多当时与《新青年》有联系的进步学者，冲破了上面所說的封建的学术环境。同时蔡先生也請一些在学术上有地位而政治上反动的人物，如拥护袁世凱称帝的“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不过这种人很少。当时北大还有拥护清室的辜鴻銘。不过他是在蔡先生以前就在北大的。

附帶說两个故事。我初到北大行开学典礼那一天，辜鴻銘作了一篇演說。他說：現在的东西都不对，例如“改良”这个字眼就不通。只听说妓女从良，現在却要改良，你要改良为娼嗎？陈独秀沒有开

过課，也沒給学生作过讲演。哲学系我們这一班，一直到我們毕业請他来照象，才算正式見了面。照象时，他和梁漱溟先生坐一起，把腿伸在梁先生的面前。象片印出后，我們送他一張。他一看，說：“照得很好，只是梁先生的腿伸得太远一点。”我們說：“这是你的腿。”他連呼“呵！呵！”。

(三)蔡先生带来了資产階級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这可以举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綱》为例。陈独秀从美国請来了胡适。胡适到北大，首先讲中国哲学史这門課。一个新回国的留学生，讲中国东西，这件事的本身就是很新奇的。他不久就出书，蔡先生为他作序，很推崇。这部《中国哲学史大綱》风行一时。这种情况，必須跟当时的具体环境結合起来，才能了解。在蔡先生到北大以前，在文科方面說，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都还是封建的；这在上面已經说过。举中国哲学史为例。給我們讲这門課的，先是陈介石先生(黻宸)，沒有讲完，他就死了。由陈伯弢先生(汉章)接讲。陈介石先生給我們讲，从前三皇、后五帝讲起，每星期四小时，讲了一个学期才讲到周公。我們問他，象这样讲，甚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說：“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要讲完一句話就可以讲完。要讲不完就是讲不完。”后来陈伯弢先生接着讲基本上就是《宋元学案》、《明儒学案》那一套。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是給比我们低的班讲的。他的中国哲学史和陈伯弢給我們这一班的讲的中国哲学史同时开課。有一次，陈伯弢一上課就拿着胡适的讲义笑不可仰。他說：“我說胡适不通，果然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綱，現在又有哲学史大綱，岂不成为大綱的大綱，不通之至。”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来，当时学者对于“哲学史”这門學問性质，是完全不了解。胡适用資产階級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写的中国哲学史，出来以后，自

然使人耳目一新。

蔡先生在北大的贡献,我认为,主要是这三方面。这三方面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可是就当时具体情况说,这些都是封建的东西的对立面。就破除封建的东西说,这三方面的东西在当时都是进步的。因此,它们能使北大精神一振,面貌一新,为即将到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扫清了道路,为“五四”运动作了准备工作。

我于1918年毕业,离开了北大。1918—1919这个学年中,马克思主义在北大展开了传播,北大的学风更向左倾,终于爆发了“五四”运动。这一年我不在北大,有许多事都没有身历其境。

我于1928年到清华。这时候的清华,跟以前的清华,已经有所改变。清华历史的变迁,是中国留学政策的变迁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学术日趋独立的过程的反映。从太平天国革命以后,清朝政府就派幼童往美国留学。后来计划,先使幼童在国内学习一个时期,再派遣出国。清华就是这样的一个留美预备学校。1911年,我在中学的时候,清华招生,我有意报考,但自顾年龄已非幼童(当时我十六岁),没有报考。可是我的同班也有几位,隐瞒岁数,也考上了。当时清华的教学,是高中程度。原来计划,毕业后到美国入大学一年级,实际上很多清华毕业生到美国插入大学二年级,也有插入三年级的。“五四”运动后,中国学术独立的思想占了优势,清华也计划转变为正式的大学。我到清华的时候,正是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之中。当时的学生,只有几百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旧制,还是预备留美性质,毕业后出国。一部分是新制,即大学本科,毕业后不出国与其他大学毕业一样,自找工作。旧制是以前遗留下来的学生,自有新制以后,不再招旧制学生。

这是清华历史中的一个大转变。可是在1928年,清华还仍称为

清华学校，在組織上，学风上，还有很多原来的留美预备学校的残余。1928年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政权达到北京的时候，派罗家伦为校长，接收清华。清华也乘此机会把这些残余，一举扫除，成为一个正式的国立大学。在这一年，清华作了不少的改革。

清华原名为清华学校。这个名字不表示学校的性质。1928年起正式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确定清华已由留美预备学校改为正规的大学。

清华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办的，所以原来归外交部管，不在正规的教育系统之内。以前的历任校长，大部分是外交界的官僚。1928年后，改归教育部管，与其他大学居于同等的地位。这在当时南京的外交部和教育部之间也有一番争权夺利的斗争。最后教育部得到胜利。当然，按当时政权的性质说，无论归甚么部，都还是在国民党手里。不过归教育部管，可使清华归入正规教育系统之内。这在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清华原来有基金管理委员会，美国公使为委员之一。实际上是，美国虽说退回庚子赔款而仍操干涉之权。还有董事会，大部分是外交部的官僚。1928年废除了基金管理委员会和董事会，这使清华进一步脱离了美国公使馆和外交部的影响。

照清华原来的制度和风气，西学在中学之上，美国教员在中国教员之上，职员在教员之上。这些情况，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在教育方面的反映。当时的学校都不能免，但是在原来的清华特为显著。清华的教员住宅分为北院、南院和西院，北院全是小洋房，南院也有一部分是小洋房，这些上等住宅，主要的是美国教员和教西学的教员住的。南院的一部分和西院是中国式小房子，这主要的是教中文和小职员住的。另外还有甲、乙、丙三所，是校长、副

校长和教务长住的。高級職員薪金比一般中国教員高，权力也大。1928年以后，革除了这些現象。教員住宅的无形的等級也去掉了。高級職員薪金降低，教授的薪金和地位都提高了。清华原来对于洋教員的待遇特別高，而且还有各自的合同。1928年以后，不分中外教員，同工同酬；取消了外国教員的特殊地位。有一位教音乐的外国教員，在教一个女学生鋼琴的时候，有不正当的表示，清华把他立刻辞退。他以合同期限未滿为借口，以找公使为要挾。清华不理这一套。他还是离校了事。

1928年清华动用一部分基金，扩建图书馆，建筑生物館。嗣后直至抗日战争开始，几乎每年都有新建筑，校舍大为扩充。

1928年，清华规定，每年预算中划出百分之二十，作为增购书籍仪器之用。清华预算嗣后不久即定为每年一百二十万元。每年有二十四万元增购书籍仪器。直至抗日战争开始都是如此。

罗家伦在就校长职的时候，发表演说，提出“四化”，即“学术化”、“民主化”，“紀律化”，“軍事化”。前二“化”是“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的别名。后二“化”是冒充“革命”精神，其实有法西斯的意味。上面所說的各項具体措施，是前二“化”在一定程度上的具体表现。后“二化”只行了几个月的时期。1928年暑假后，实行所謂軍事训练，校长、教务长都穿上軍装。学生每晨早操，无故缺一次，記一个小过。三个小过为一大过，三大过开除学籍。有一个同学記到八个小过，只差一个小过，就要开除，可是軍事训练恰好也停止了。

清华新制毕业的学生，就如其他大学毕业一样，沒有留学的权利。跟旧制毕业的学生，权利差別太甚。1928年后，定出一种調剂办法。清华每年还送留学生四十名，公开招考。清华新制毕业的，录

取二十名：別的大学毕业的，录取二十名。录取的不限定往美国。后来清华自办研究院，停止招考留学，只送本校研究院毕业成績优良的出国留学。研究院招生公开考試，本校毕业的学生也須同样經過考試。

清华原来是留学預备学校，毕业到美国入大学。后来改为只送大学毕业的学生，到国外入研究院，不限定往美国。后来又改为只送研究院毕业生，到国外繼續深造。抗日戰爭以前的清华，始終是与派遣学生出国留学有关系的。它的留学办法的改变，是中国学术日趋独立的反映。

1917年是北大的大改革时期，1928年是清华的大改革时期。中国原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在1916年以前，大致說起来，北大是半封建社会在学术教育方面的反映。1928年以前，大致說起来，清华是半殖民地社会在学术教育方面的反映。1917年北大的改革，半封建性质打破了，代之以資产階級性质。1928年清华的改革，半殖民地的性质打破了，代之以民族資产階級性质。当然，1917年以后，北大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也是民族資产階級思想。上面的說法，只是表示，1917年以前和以后，北大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是封建和資产階級的对比；1928年以前和以后，清华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是买办資产階級和民族資产階級的对比。

1928年以后，清华建立了一些制度，为当时教育界所称道。其中之一就是所謂教授治校。这个口号本来是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但是在清华得到比較具体的实现。1928年以后，清华有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組成。有評議會，由校长、教务长、秘書长、各院院长及教授会所举的評議員組成。有校务會議，由校长、教务长、秘書长和各院长組成。各院院长的产生，是由教授会提名，每院二人，

由校长于二人中择一聘任，每二年改选一次，但連选得連任。照理論上說，校长只有权聘任教务长和秘书长。在校务會議和評議會中，校长一方面的人只有他自己、教务长和秘书长共三个人，其余的人都是由教授会选出来的代表，占絕對多数。（当时清华有文、理、法、工、农五个学院，出席校务會議的有五个院长。）照理論上說，教授会对于校务有絕對的支配权。这就是所謂教授治校的具体形式。

可是，实际上，如果校长善于运用，他不但可以不招致教授会的反对，而且可以使教授会轉化为自己的工具。前北大校长蔣梦麟是解放前教育界的老油子。他从經驗中得到一个規律。照他說：在一个大学中，校长、教授、学生是三种势力。如果三种之中，有两种联合起来，反对其余一种，一种必然失敗。梅貽琦跟教授相处很好，常称：大学者，有大師之謂也；校长的职务是率領職員为教授服务。在这种运用中，他其实掌握了大权，并且在学校有事的时候，教授会总是帮他的忙。后来的几次学生运动中，教授会总是跟校长在一边。按当时校长和教授的階級性說，这是必然的。

按階級說，国民党政府和其所派的校长，以及多数的教授都是資產階級的代表，在重大問題上，特別是政治性的重大問題上，他們总是一致的。但是在个别的问题上，所謂教授治校对于当时国民党政府也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例如在清华和后来的西南联大，没有靠政治力量进来的教授，也没有靠政治力量进来的学生。特务没有在学校公然活动，学校当局也没有报告过黑名单。这些情况，在当时的大学中，也还算比較少見的。教授的聘书虽然是每两年发一次，但一般的教授都觉得自己的地位很稳固，不象有些大学，教授每到暑假都要有一次惶惶不安。在西南联大的时期，教授中有在政

治上极右的，也有在政治上很左的，也有教授对于国民党“小鵝大帮忙”的。当时学校的风气是，认为只要教授能把他的課讲好，他在政治上的态度，学校不管。在这种风气下，学校沒有考虑过怎样把进步的教授解聘。当时认为清华教授有自由、民主作风，其原因就在于此。当然这所謂自由、民主，只是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所謂学校不管，也有一定的限度。当时的教授，一般地說，也都没有超过資產階級自由主义的限度，所以能維持所謂民主、自由的局面。

1928年后清华还提倡所謂“通才教育”；这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影响。当时的想法是，大学，特别是其中的文法科，首先要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其次才是成某一方面的专家。当时所謂全面发展，也只是限于知識方面，所謂“人”，也是資產階級性的“人”。資產階級教育，认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要对于事情能从資產階級的立場和观点，判断其是非。梅貽琦常說：清华的教育并不告訴学生国民党对或是共产党对，只要养成他們自己判断的能力。当然，如果学生都有了資產階級所希望有的能力，他們是会认为共产党不对。幸而至少有一部分学生不是照資產階級所希望的。

在清华，实现“通才教育”的具体措施是，着重所謂公共必修課，主要的是文学、語言的訓練和历史及一般文化的知識。在文学院，第一学年的課程，各系都是一样。到第二年才逐漸分系。到第三、四年，各系的課程才完全分开。这对于学生的所謂“基本功”的訓練，有一定的好处。

1928年以后，清华北大，互相学习，所謂“北大清华化，清华北大化”。在抗日战争时期，北大、清华和南开，合組为西南联合大学。在这时期，本科学生是公同的，三校还各自保持自己的基本教师队伍和自己的行政組織，也都有自己的“私房”办的事业，例如自己

的研究所和研究生。所以在学术上还都保持自己的风格。就哲学系方面說，北大的哲学系注重在資產階級哲学經典的学习，注重哲学史的学习。清华的哲学系注重在資產階級哲学問題的分析和解决，自命为注重“創作”。我在当时說：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学生，如果不能学好，至少也可以有些哲学史的知識。清华哲学系毕业的学生，如果成功，可以成为哲学家，如果不成功，就甚么也不是，所謂“成則为王，敗則为寇”。在历史学方面，北大注重在史料的搜集和考訂，清华着重在对于历史事实的分析和評論。当然这些搜集、考訂、分析和評論都是从資產階級的立場和观点出发的。

1928年以后，北大和清华是旧中国教育界比較有影响的大学。“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在这两个大学中，按当时的标准說，得到比較具体的实现。可是，到了抗日战争的时期，馬克思主义广泛傳播起来，共产党的领导也日益强大。原来在“五四”前后起进步作用的东西，也就轉化它的对立面，成为反动的东西了。

“为学术而学术”“学术自由”等口号以及資產階級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在其反封建的时候，是进步的东西，这在上面已讲过。后来这些东西成为反对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武器。在“五四”以前，所謂“为学术而学术”是說，不要以学术作为求功名利祿的手段。后来，所謂“为学术而学术”是說不要革命，只要念书本。在“五四”以前，北大在“学术自由”的掩护下，請来了陈独秀和其他很多的进步教授；“学术自由”的目的是为进步的教授爭地盘。后来“学术自由”成了反对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武器。据說，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主張无产階級专政，专政是与自由不相容的，这时候的“学术自由”不适用于讲馬克思主义。这正是資產階級专政的表现，在这时候，“学术自由”成了为保守反动思想保留地盘的工具了。

所謂教授治校，就清华所采取的形式看，就理論說，是可以作为反对校长或限制校长职权的工具。但要看校长是代表什么政权的。在过去，如上面所說的，如果校长运用得当，教授会可以成为校长的工具。这也是因为在当时，一般的教授和校长基本上是属于一个阶级。在解放以后，校长是无产阶级政权的代表，而多数的教授，在思想还没有改造的时候，还基本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行“教授治校”，譬如說，用清华过去的形式，教授会可以跟校长对立起来，成为教育改革的大阻碍，甚而至于可能在学校内部出現资产阶级复辟。

解放以后，北大、清华都有了根本的改革。清华的文、理、法科，并入了北大。北大的工科并入了清华。这两个大学，你中有了我，我中有了你，都还是新中国的教育的重鎮。返觀一下它們的历史，其中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有許多也还是可以借鏡的。

1962年8月于海拉尔

李石曾与北平大学区

吳 范 寰 *

一 李石曾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

李石曾名煜瀛，河北省高阳县人，1877年生，是清同治年間大學士李鴻藻第五個兒子。幼年席乃父余蔭，以蔭生的身份作過度支部郎中，留學法國，習生物學和哲學。他是從大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又雄于資財，野心很大。他看出清王朝已屆末日，不再作繼承先志之想。由於在巴黎時和張靜江，吳稚暉、汪兆銘一班人常在一起，因而他加入了同盟會。但他並不真信仰三民主義，而總想另樹一幟，來展布他的野心。於是常與吳稚暉等聚議，在1905年創辦了“世界社”，宣揚無政府主義，信仰蒲魯東的學說，反抗進步潮流。以世界社名義先後創辦《世界週報》和《世界畫報》，倡導無政府主義。例如他在推崇蒲魯東的一文里，說蒲魯東主張人類互助，和馬克思的階級鬥爭恰恰相反。又說馬克思主張鬥爭，蒲魯東主張互助，馬克思主張專政，蒲魯東主張合作。他並引伸蒲魯東的主張，說他將來辦一切事業都將以互助合作作信條。以後他和張靜江等在法國辦過豆腐公司，開過古玩店（以互助合作之名而大賺其錢）。再後又辦過勤工儉學會，里昂中法大學等等。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長，他也

* 編者注：作者曾任北平大學校長辦公處秘書，并兼《世界日報》社經理。

回国，在北京大学作过一个时期生物学教授，很少上课。其后把法庚款的支配权抓到手里，在北京创办中法大学、孔德学校和温泉小学等。为了参加政治活动，经常往来南北，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已当上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到南京以后，勾结张静江、吴稚晖一班反动老头子，以国民党元老自居。

李石曾借拥护蒋介石反动政权来扩展他自己的势力，在蒋王朝时代，始终是蒋的一个忠实走狗，值得提出的，有以下几点：

（一）在蒋介石叛变革命时，李石曾在反共清党方面出过很大力量，除支持蒋的血腥镇压措施外，并在1927年5月发表过《打倒共产主义论》一文，为蒋介石张目。在蒋介石反动统治时期对蒋的一切举措，无不全力支持。虽然蒋并不认李为心腹之臣，但认为李在教育文化方面作他的得力爪牙却很合式。

（二）在1930年，閻馮掀起倒蒋运动，发生中原大战时，李石曾自告奋勇奔走东北，协助宋子文、吴铁城等为蒋作说客，诱张学良助蒋。在东北时，以张学良的部属胡若愚、朱光沐等均为北大学生，乃借师生之谊大肆活动，助成东北军入关、閻馮垮台的实现。

（三）在1948年秋季，蒋介石反动军队在国内各个战线上濒于崩溃之际，李为表示对蒋的忠诚并为保全他的北方财产事业，曾在是年9月间以出席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的名义北来探看形势。到北京后，在中法大学举办文献展览，以欢迎世界社社友名义举行盛大集会。开会时李以代理社长名义（吴稚晖是正式社长）致词，略谓“世界社成立已有四十三年历史，本定在四十五周年时开一比较大规模的会，并举办有系统的展览，今年只能作局部展览。这次开会的特别意义是北平研究院的学术会议就要召开，因此借机会欢迎参加学术会议的学者来参加世界社的纪念会”。他又说：“世界社在

成文方面有四十三年历史,在不成文方面历史更长,最早是由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所发起。中山先生革命时期,就很重視世界社。中山先生曾參觀过世界社所办的很簡單的一所生物試驗所。孔德学校、温泉小学等都是世界社創辦的。世界社的事业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在开会前后,李与一部分到会的人接談,探詢北方局势,并劝說緊張时大家都应設法离开。这是他在国内最后一次的反动活动。

二 張作霖时代的北京各院校和李石曾

壟断北方教育的阴謀

在北洋軍閥統治末期,北京的高等院校,有: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工业大学、农业大学、法政大学、医科大学、女子大学和艺术专科学校等所謂国立九校。此外还有清华学校改組的清华大学,外交部的俄文专修館,交通部的交通大学,財政部的稅务專門学校,加上教会办的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以及私立的中国学院、朝阳学院、民国学院、华北学院等等,总共不下二、三十所。在那个时候看,北京的高等院校比全国任何一处都要多。負笈来学的人数逐年增加,知名的教授和学者也集中于此。

在1927年国民革命軍北伐时期,奉系軍閥張作霖占据北京,华北和东北都在他的势力控制之下。1927年6月,張作霖自称安国軍大元帅,在北京建立大元帅府。儼然以中华民国的元首自居。同年8月,下令合併北京国立九校为京师大学,以教育部长刘哲兼任校长,下設文、理、法、工、农、医、师范等学院和美术、商业等专科,以胡仁源、張貽惠、毛邦偉、孙柳溪、林修竹等为院长。刘哲于8月10日派員接收各院校。就职之日,宣布其大开倒車的治学方針,禁止